

# 传承与建构——华人文化调适的研究思路

## Ideas for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al Adaptation

安焕然\*

(ONN Huann Jan)

### 摘要

战后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变迁，是一个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学界花了不少心力在谈论华人文化的持续、同化、涵化、融合等问题，但是，我们更需关注的是其文化调适的程度问题，华人社会如何进行其既本土化又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调适。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建构，不能忽略在地国家政策的制约和干预因素，必须正视不同地区华人社会内部复杂的差异性和其独特性的历史渊源，以及政治经济和世界思潮的考虑。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变迁、文化认同

###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Overseas Chines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in many ways preserved and reinvented Chinese cul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created new cultural models. Most researchers have been focusing on how Chinese communities preserved their culture as they went through adjustment, 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 However,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gree of their cultural adaptation—how Chinese commun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reshaped their culture by adding in local elements. To discuss the cultural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ies, we must take account of the influence of policies implemented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ous Chinese communities, socio-political issu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ominant ideologie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Malaysia, Chinese, Culture Change, Cultural identify

战后以来，东南亚各地的现代化以及强调同构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华人无论是在认同上，抑或在文化变迁上，都面临了剧变。本文拟从华人文化的持续抑或同化、华人的涵化、内衍抑或创造，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复杂性，对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变迁这一“文化调适”的问题，进行学术史的探讨。

---

\* 安焕然博士 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电邮地址：an\_huanran@yahoo.com

## 一、前言

关于华人文化之持续抑或变迁的课题探讨，维多巴素（Victor Purcell）提出“中华文化持续论”，认为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本身具有牢固的凝聚力特质，华人在移居地即使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仍能长久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很难融进当地社会。（Purcell 1967: 289-292）然而，他这种“华人不变更论”的看法，是经不起历史验证的。

在东南亚独立建国的背景下，华人的同化和效忠成为重要课题。与“中华文化持续论”相对的，有施坚雅（L. G. William Skinner）等从实证角度论证华人同化问题。（Skinner 1957, 1958, 1960）同化论（assimilation）在冷战时期提出，有其时代性，在战后之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社会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验证，泰国华人的同化是较普遍而和谐，印度尼西亚华人则是被强迫同化。一段时期，同化论被一些学者引用，<sup>1</sup>并认为是解决华人问题的“利器”，以为华人一旦被同化，与土著浑为一体，东南亚的华人问题就解决了。（崔贵强、古鸿廷1978: 18-22）然而同化论并不适合于新马华人社会，而且即使是泰国华人，亦不见得就能完全被同化。施坚雅等的同化论有被夸大了其实际效用，值得商榷。（Tong & Chan 2001: 9-40）同化论的研究取向也忽略了本土族群之间文化接触的双向互动。

## 二、华人的涵化

战后以来，东南亚各地纷纷独立建国，华人面临政治认同的抉择。（崔贵强，1989）但是，在东南亚多元复杂的社会里，政治上效忠于当地国，不必然意味着华人的社会与文化就得被土著同化。

深具“本土”研究视角的马来西亚学者陈志明认为，在文化调适上，华裔通常是以经济利益和文化、民族认同这两种条件作“理性”之选择来调整适应于不同环境的族群关系。（陈志明1990: 1-26）陈志明应用了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来解析华人文化的变迁问题，并认为，在涉及一个族群文化向另一个族群文化变迁的过程时，用涵化这个概念，比同化更为适合一些，因为这可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陈志明2002: 232-233）所以，如果要检视华裔涵化的主要因素，就必须分析族群间的社会互动的背景以及文化、社会和政治等相关要素。陈志明这种关注到当地社会族群间的互动关系，为东南亚华人研究引导出一条新的研究取向，更深入地建构了华人在居住地与当地土著或是其它族群之间的关系图像。对华裔涵化的研究，陈志明认为东南亚的土生华人（Chinese Peranakan）或是新马华人社会的峇峇文化，是涵化的直接产物。（Tan 1983, 1979, 1988, 1993 & 2002）

---

<sup>1</sup> 例如（魏安国）Edgar Wickberg. 1965.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见魏安国著，吴文焕译，1989，《菲律宾生活中的华人 1850-1898》，世界日报社、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出版。

陈志明指出，涵化源自对主流文化环境的社会与文化调适。涵化的结果实际上来自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因而东南亚华人涵化的程度各有不同，即使是马来西亚华人，仍有峇峇和“纯华人”（“pure” Chinese）之分。峇峇失去了华人语言，但其华人意识并不比“纯华人”少，他们强调某些华人传统来表述他们的文化认同，甚至以迄今仍保留了传统的华人婚礼习俗为荣；相比之下，“纯华人”则较强调华文读写能力和华文教育（陈志明2002：255），在华教意识的建构上，坚信“语言是民族的灵魂”，不能数典忘祖。

然而，陈志明对“纯华人”一词的使用值得商榷。何谓“纯”（pure）？<sup>2</sup>实际上，战后以来，坚持维护华文教育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他们主要是把华教和华语视为族群认同和族群凝聚的文化象征，然而彼等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很多早已是涵化或现代化了。故把重视华教、华语的这批马来西亚华人称为“纯华人”，在表面词意上易引起误会。笔者认为，与其用“纯华人”，不如还是称之为强调“华人性”的华人社群，会比较恰当一些。

而且，应当留意的是，原本被寄望能成为“涵化典范”的峇峇社会，如今在马来西亚却已是日渐萎缩，成为“没落的贵族”。反倒是因战后，特别是1970年代新经济政策推行以来，政策执行上的偏差，造成种族关系尖锐的两极化现象，华人社会的“华人性”反而被高度的强调。研究这种涵化较少，“华人性”高涨的华人社群，是把握当代马华社会脉搏相当重要的研究面向。而这种族群文化认同意识的强化，又是来自于华人社会面临族群存亡自救的一种文化策略。

### 三、挑战与响应：“内衍”抑或“创造”

台湾学者李亦园很早就注意到东南亚华人这种“华人性”文化认同意识的高涨和社会整合的变化现象，从而提出华人“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的诠释概念。李亦园所谓的“本土运动”是指两个文化接触之时，某一文化的部分成员（因感于外来文化的压力）企图保存或恢复其传统文化的若干形态之有意及有组织的行动。这一运动又可分为“巫术性”的和“理性”的两种。前者如将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在海外发扬光大，后者则如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的复兴等，通过这些“本土运动”来企图拯救自身文化。（李亦园1985：1-14）李亦园用此“本土运动”来说明华社文化自救自立的现象，虽然在术语上与一般“本土化”的概念产生

<sup>2</sup> 并不是陈志明在内涵论述上的不恰当，而是指用词上的精确问题。“纯”指的是血缘，还是文化？生物性的血统论已备受学界的质疑。即使是指文化上的“纯”，峇峇保留的传统家庭礼俗岂不更“纯”？因而，使用“纯华人”一词易引起误会。

混淆，<sup>3</sup>但是他注意到了东南亚华人社会在不同外在压力和不同的时代，均可能产生不同的反应，此论见是值得重视的。<sup>4</sup>

此外，施振民挪用人类学家吉尔兹（C. Geertz）的“文化内衍说”（cultural involution），认为战后菲律宾华团面对外界巨大压力下，依赖内衍“复化”传统形式，以求自保。（施振民1985：105-206）这样的理论借用，虽有很好的阐释面向，但是，以文化内衍涵盖一切，似乎也过于简单化。（宋平1995：6）华人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强调，是文化的复古，抑或是传统的再创造，同时也具有现代意义？这是很值得再去深入探究的课题。

两位原籍马来西亚，同时在1980、1990年代留学台湾的青年学者：李宝钻和林开忠，在这个研究课题上提出了更为精辟的立论。李宝钻在《马来西亚华人涵化之研究——以马六甲为中心》的硕士论文中认为，马来西亚华人从“内地化”过渡到“土著化”的历程，基本上可视为华人被涵化的结果。<sup>5</sup>然而，在马来西亚华人的涵化过程中，华人一方面认同这块土地（马来西亚），但也深深意识到身为一名华人，无论如何努力融入当地文化或者是完全放弃本身的文化而接受同化，却始终无法改变自身为华人的肤色，因此唯有善用自己固有的优良文化传统，适度地融入当地社会，始能在这片土地上与其它族群和平共存。这正是马来西亚华人体认到涵化可以增进华人与马来族群之间交往的写照。（李宝钻1998：162）

<sup>3</sup> 刘宏就曾指出，本土化（或在地化）与李亦园的“本土运动”在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后者指的一种宗教或理性的“复古”（汉化）运动。而战后新马华人社会的本土化过程是在当地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发展出的一套具有自身特征文化体系，虽然这种体系具有中华文化母体的烙印。刘宏，2003，《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页8。

<sup>4</sup> 李亦园把东南亚华人视为“中国文化的实验室”，其问题不是出在论述的过程上，而是出在结果及其相关的视角问题。他认为“这些不同的外在压力和不同的时代因素，便是华侨社会与中国文化主流相异的变量，详细比较这些变异，将是研究中国文化和它的海外试验场的人所乐于从事的。”而且，他认为“华人性”的强调，是一种“复古”运动。实际上，战后以来，马华社会的一些对传统文化的复兴运动，以及对华教的支持，不仅不是一种复古，而且还是一种“本土化”的建构，以及具有“现代性”意义转化的文化创造。

<sup>5</sup> 内地化和土著化曾是台湾学界争论的课题，见李国祁，1979，《清季台湾社会的转型》，《中华学报》第5卷第2期，页131-159；陈其南，1984，《土著化与内地化：论清代汉人社会的发展模式》，《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页335-366。但是，笔者认为，内地化或是土著化理论基本上是台湾汉人研究的范畴，虽然它有意要与东南亚华人社会做比较研究，但此研究模式并不见得能很好的阐释马来西亚华人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变迁问题，而且也不需刻意去套用这两种理论。因为不论是“内地化”或是“土著化”理论，都仍然是把华人社会当成中国社会的延长或扩展来看待。即使所谓的“土著化”，亦是指建立另一个传统中国社会的过程，认为中国本土社会的扩展，其真正的基础是建立在外移社会的“土著化”之转型，而非仅止于单纯的地理延伸。陈其南曾指说，基本上，台湾汉人已发展为一土著社会，而华侨社会则始终是“移民社会”，这样的一种缺乏对东南亚华人社会历史情境的对比，得出的立论是不切合实际状况的。见陈其南，1994年二版（1987年初版），《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修正版），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页181-182。

林开忠《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一书，（林开忠，1999）是他留学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硕士论文。书中，林开忠注意到了“马华文化”是一个“建构中”的文化，是响应于国家文化而“创造”出来的产物。此论点为学界提供了很重要的分析视角和解读方式。从族群认同的工具论出发，林开忠指出，这种华人文化的创造，“传统”已并非传统本身，而是为了“当时”的需要而建构或创发出来的，并让人们在所谓的华人文化世界里取得各种文化产品、意义和象征。但是，也是这样的一套文化论述使到对抗国族文化论述霸权的可能性受到后者的牵制，而成为不折不扣的国族文化论述的复制品。而且，这样的一套文化创造的设计，事实上主要是经由华商推动，也可能为华商阶级服务。在国家干预下，华人文化运动也重新创造了有关华人文化传统，但隐藏在这些观点里的却是一套由华裔商人或精英份子所推崇的意识形态，是它决定了华人文化的内涵及表现。

从族群文化“建构论”阐释马华文化，林开忠的论说无疑是相当精采，而且也的确是点到了华人文化建构的一些核心问题。然而，作者的局限出在他借用了西方人类学的族群建构理论来解析马华文化，却也受限于既存理论的阐释框框，把诸如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华社的内部整合等问题都给简单化了，而他对华社中“华商”的理解，也有概念化的刻板印记。林开忠的论文虽强调要纠正李亦园等台湾人类学界“去情境化”的研究取向，而主张应把华人文化建构的过程置于国家形成的框架来理解，但他本身的论说，却同样忽略了对华人社会内部复杂情境的观察。

#### 四、中国大陆学界对华人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研究概况

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的探讨也多有涉及。周南京就曾指说，华侨华人文化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延伸和翻版，但随着在“异域”社会文化环境长期而强烈的影响，海外华侨华人继承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异，而且这种海外中华文化的变异是历史的必然，其变异程度和趋向，取决于国际国内诸种因素。周南京强调“文化融合”才应是海外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选择，因为文化融合强调在消除偏见、歧视下，族群间和谐的双向互动，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周南京1994：85-89）

梁英明亦认为东南亚华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企图强制消灭华人文化，或要求华人永远保持中华文化认同的单一性或纯粹性，都是不现实的。（梁英明2006：32-38）而庄国土在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指说，一个东南亚各族群可以和睦相处的多元社会构建，不但是一种理念，也能成为现实。

（庄国土2003：1-10）此外，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注意到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有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他指出，东南亚华人并没有

形成一个统一的族体，其认同是依据自己在所在国的经历形成自己的认同。在族群接触与文化互动分析中，他强调移居地文化对华人文化的影响。（曾少聪，2004）

曹云华是援用“文化适应”理论研究东南亚华人文化变迁最力的中国学者，并以此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曹云华，2001）他认为，文化适应是一个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在与印度尼西亚、泰国华人文化适应的比较中，曹云华认为马来西亚华人基于人口比例，民主政治制度，以及华人参政和强烈的自觉意识，致使统治阶层不得不对华人文化采取较宽容的态度和政策。他指说，东南亚华人对居住国的文化适应上，马来西亚民族平等模式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这种模式只适合马来西亚国情，是马来西亚华人坚持长期和不屈不挠斗争的产物。（曹云华，1999：67-73）<sup>6</sup>从东南亚诸国华人的比较中，曹云华指出了马来西亚华人文教发展的独特性。

厦门大学历史系的陈衍德亦从“文化融合”现象去思考东南亚华人文化的传统性与当地化（本土化）问题。他认为，处于传统文化和当地文化夹击下的东南亚华人，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这一问题的实质乃是“文化变迁”的问题。华人长久保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或是被原住民同化，恐怕都很难成为现实，只有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才是可行的，亦即华人在保有自身文化特征的同时，又与当地文化产生良性互动，即使固有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又吸纳融汇当地文化，从而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海外华人文化。在面对当地化的巨大压力，当代华人不再像他们前辈那样不自觉地去适应当地文化，而是自觉地以传统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去接纳当地文化。所以，东南亚华人文化的重塑，是历史的必然。（陈衍德2004：189-201）

另，陈衍德通过对菲律宾华人社会文化的研究，注意到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二分，两者常处于一种流动的、互相杂糅渗透的状态；传统与现代构成菲律宾华人文化的一体两面，传统的东西可以具有现代化的潜力，现代的东西也可以具体展现传统的特质。（陈衍德，1998）把研究焦点放在“传统”与“现代”的社会文化变迁，对长期纠葛于华人与土著族群关系之探讨，提供了另一面向的研究。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华人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还是偏向于以“东南亚”或“国别”综论，或比较研究东南亚各国华人文化，而且多是以人类学文化调适的既有理论和研究框架来进行论述，并进一步强化在此层面的研究内容。然而，在理念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落差，东南亚的族群关系，不仅存在各种复杂的文化情意结，而且还有政治经济，甚至是阶级及公平与正义、人权意识等等的问题纠葛。若是要论“文化融合”是华人在东南亚必然的趋势，如何融合？要融合到怎样的程度？为什么能，或不能融合？融合与冲突的关键是什么？华人的文化调适，其中有无一些原则性问题需要考虑，文化传承与变迁之间的“平衡点”是什么？如何产生

<sup>6</sup> 相关论著亦可参见曹云华，2001，《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文化上的良性互动？其文化调适或文化融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还有待学者们更深入的去探研。

从文化体系的结构层次来看，面对本土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华人文化在涵化过程或文化调适过程中，消失了什么，保留了什么？周聿峨、代帆在〈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一文认为，海外华人即使显象的文化因子在文化融合的进程中消失，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根植于个体内心深层的精神，却可以长期保存下来，例如祭祖、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尤其在价值取向上，更保留很多中国传统的色彩，如服膺自然、崇古和内向发展，依然不放弃孝道、人情、面子、勤俭、报答、秩序、中庸、和睦和分享等中华文化价值。（周聿峨、代帆2002：337-347）然而，王赓武却认为华人在进行文化调适过程中无实质可言。华人一直在设法应付全球化多变的形式和强度，多数华人对其文化的哪些方面需要保持，哪些可以放弃，都表现得相当变通和实用。（王赓武2002：214-215）显然，王赓武是以“工具论”来看待华人的文化调适和建构的。华人的文化变迁，其变与不变是什么？为何如此？亦是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五、历史的透视：东南亚华人的复杂性

相对于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关于华人文化变迁问题，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他们深具历史透视的研究向度。历史学向来关注于复杂的历史时空脉络和对“人”的因素考虑。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意识<sup>7</sup>向来是学界讨论的一个课题，而王赓武就注意到华人认同意识的复杂性。战后1950年代，是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转变的分界线，但华人政治认同的转向，不一定意味着文化认同的改变。王赓武认为，战后东南亚华人具有“多重认同”（multiple identity）的特性，这种“多重认同”包括了国家（当地）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村社认同和阶级认同。（Wang 1991：207-208）华人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会有指涉不同的认同。因而，研究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变异，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是两回事，却又是同时存在于当代华人的认同意识之中的，两者的认同并不矛盾。<sup>8</sup>

其次，历史学家研究海外华人问题，其历史的透视性向来较注重“时间的深度”。畅游于西方、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王赓武<sup>9</sup>的华人史论述，一方面超越了

<sup>7</sup> 认同（identity）原指身份、个性的意思，当作术语使用，带有归属感的涵义。

<sup>8</sup> 谢剑认为，东南亚华人的多重认同中，不可能既认同居留国又认同中国，但是，重要的是华人仍坚持族群的文化认同，就多元文化的存在，通过彼此的学习和借用，互补互励，对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有益无害，更能繁荣整体文化的内容。详见谢剑，2006，〈东南亚华人的认同问题：对R. J. Coughling 双重认同理论的再思考〉，《台湾东南亚学刊》第3卷第2期，页3-18。

<sup>9</sup> 周南京把王赓武等这类能自由畅游于东西方，“逐水草而居”的知识分子称为“边缘型”的海外华人。见周南京，1994，〈文化融合是历史的选择——海外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变异〉，《东南学术》第4期，页86。

中国传统史学“中国中心观”的格局，将东南亚当地居民的语境引入分析之中；另一方面，其研究方法主要仍是历史的，尤其表现在他的著作中对“历史进程”及其因果关系的高度重视，因而注意到华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其特色。

（刘宏2003：62-69）例如在《中国与海外华人》一书，王赓武以类型性质与跨时限（diachronic）观念的交相配合，注意到不同时期历史阶段性的发展特色，把海外华人移民的历程，按时间的维度，分成四大类型：华裔型、华工型、华侨型、华裔或再移民型，是一个颇具时间深度的历史学范式。（Wang 1991：3-21）

另，颜清湟以社会史的关怀向度，重视到历史的“空间”的概念，指说华人文化的传承与变化，与不同地区的华人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他认为，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发展是以华人社区所发生的变化为基础的，而且文化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颜清湟2006：213）颜清湟指出，华人社区的社会文化变化的力量，既来自内部，又来自外部。内部力量包括华人社会内部的次社群的整合和冲突，而外部力量则有中国，亦有来自当地政府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以及世界的局势变化的影响。因而，华人文化的延续和变化，受到本土化的影响而必须进行文化调适，也与因外部压力与刺激所做出的响应有关。而且，东南亚华人的文化变迁实际上常是因社区的地点、规模、同化的程度和政府对华人的政策的不同而不同。（颜清湟2006：213-225）

颜清湟的东南亚华人社会史研究，史料引用广泛而严谨，举凡官方档案和民间文案，引用详实，研究扎实，是学界公认的东南亚华人史专家，其《新马华人社会史》（颜清湟，1991）是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必读之书。颜清湟强调华人史研究应回到最根本的客观态度和科学方法，对学界一些轻率套用理论的学风，颇不认同，并严正指出了彼等的错误。（颜清湟2006：47-52）

总的说来，颜清湟所提出的严谨和客观的史学方法，是探讨华人社会文化问题时不应放弃，必须去承继的研究方法。在众多既存理论错综成列之际，与其不顾实情地泛论，抑或过于简单地套用理论，不如扎实地做较全面的分析。毕竟，历史学研究，必须回到“历史现场”，把握历史脉络，将所探讨的主题放置于不同时段和不同地区的特殊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才能清楚探出其变迁的脉络和特色。

当然，强调历史学的严谨方法，并不表示就刻意排斥理论，回避后现代史学的参照。值得一提，Sharon A. Carstens把握着历史脉络的发展，以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学理论，把“历史文献”当“文本”来解读，探讨叶亚来的历史诠释在不同时期的改变，解析叶亚来形象如何从神话走向历史的舞台，从而相互论证了不同时期华人社会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意识转变。她的这种研究方法，对华人研究来说，相当新颖，也具有一些“历史人类学”的影子。（Carstens 1988：185-208）<sup>10</sup>

<sup>10</sup> 另，Sharon A. Carstens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文化和认同的论文已结集成书，见Sharon A. Carstens. 2005. *Histories, cultures, identities: Studies in Malaysian Chinese world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六、结语

华人的文化调适，诚如曹云华所说，是一个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因而其传承与变迁，无疑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建构历程。学界花了不少心力在谈论华人文化持续、同化、涵化、融合等问题，但是，如果说文化调适及涵化是战后以来必然的趋势，更需关注的是其文化调适的程度问题，华人社会如何进行其既本土化又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调适？其建构中的华人文化的社会资源、历史资源及文化资源有哪些？这方面的学术导向仍有待开拓和延伸研究。

“战后”是华人社会文化明显急速变迁，乃至再建构的重要时期。在这六十年来，华人为何在文化调适中，有融合、有冲突、有创新、甚至有对传统的复兴？涵化较少，重视华人传统文化的承传和维护华文教育，对“华人性”的强调，是否只是一种文化内衍“复古”现象，还是其本身就已是一个传统的再创造，更具现代性意义的本土化的文化调适过程？

忽略国家政策的制约和干预因素，忽略不同地区华人社会内部复杂的差异性及其独特的历史渊源之把握，以及忽略对政治经济和世界思潮的考虑，泛谈文化融合，恐怕只不过是隔靴搔痒的象牙塔话语。

战后华人文化的建构，“国家”与（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是不可规避的研究课题，但是，在借助于后殖民论述对“国家”与“社会”理论的挪用上，要注意到本土历史的语境，把握与其相关的历史脉络，更要留意到其外部和内部更为复杂的各个层面，非仅以文化抗争，民间社会“对抗”国家霸权的二元对立简单立论就能概括。

国家政策上依循“最终目标”，强调一致性的国家文化霸权对华社民间社会的自主性不断进行蚕食的紧张关系过程中，“华人文化”的重新再建构具有怎样的现代意义，国家与（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如何？华人文化格局的形成，既有国家政策的制约，亦是民间华社自发的组成，“官民关系”或许也不是一个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关系。除了对抗与协商的文化策略应用，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否还有一些更为关键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 参考文献

- 曹云华，1999，〈试论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3期。
- 曹云华，2001，《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曹云华，2001，《从文化适应的角度看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广州：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外关系史专业。
- 陈其南，1984，〈土著化与内地化：论清代汉人社会的发展模式〉，《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一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页335-366。
- 陈其南，1994年二版（1987年初版），《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修正版），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陈衍德，〈当代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双向互动〉，陈衍德，2004，《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长沙：岳麓书社，页189-201。

- 陈衍德, 1998, 《现代中的传统——菲律宾华人社会研究》,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 陈志明, 1990, 〈华裔和族群关系的研究——从若干族群关系的经济理论谈起〉, (台)《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69期, 页1-26。
- 陈志明著、巫达译, 〈涵化、族群与华裔〉, 郝时远主编, 2002, 《海外华人研究论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崔贵强, 1989,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崔贵强、古鸿廷, 〈导言: 东南亚华人的今昔〉, 崔贵强、古鸿廷合编, 1978, 《东南亚华人问题之研究》, 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页18-22。
- 李宝钻, 1998, 《马来西亚华人涵化之研究——以马六甲为中心》, 台北: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第28辑。
- 李国祁, 1979, 〈清季台湾社会的转型〉, 《中华学报》第5卷第2期, 页131-159;
- 李亦园, 1985, 〈东南亚华侨的本土运动〉, 李亦园、郭振羽主编, 《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上册, 台北: 正中书局, 页1-14。
- 梁英明, 2006年12月, 〈从东南亚华人看文化交流与融合〉,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4期。
- 林开忠, 1999, 《建构中的华人文化: 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 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 刘宏, 2003, 《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 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刘宏, 2003年, 〈王赓武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 方法论的初步观察〉,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 页62-69。
- 施振民, 〈菲律宾华人文化的持续〉, 李亦园、郭振羽主编, 1985, 《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上册, 台北: 正中书局, 页105-206。
- 宋平, 1995, 《承继与嬗变——当代菲律宾华人社团比较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 王赓武著、张海洋译, 〈海外华人的文化中心〉, 郝时远主编, 2002, 《海外华人研究论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魏安国著、吴文焕译, 1989, 《菲律宾生活中的华人1850-1898》, 世界日报社、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出版。
- 谢剑, 2006, 〈东南亚华人的认同问题: 对R. J. Coughling 双重认同理论的再思考〉, 《台湾东南亚学刊》第3卷第2期, 页3-18。
- 颜清煌, 2006, 〈新马华人史研究的反思〉, 《南洋问题研究》第2期, 页47-52。
- 颜清煌著、栗明鲜等译, 1991, 《新马华人社会史》,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 颜清煌著、周添成译, 〈东南亚华族文化: 延续与变化〉, 吴晶主编, 2006, 《华侨华人研究论丛》第七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页213-225。
- 曾少聪, 2004, 《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 周南京, 1994, 〈文化融合是历史选择——海外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变异〉, 《东南学术》第4期。
- 周聿峨、代帆, 〈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 郝时远主编, 2002, 《海外华人研究论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页337-347。
- 庄国土, 2003, 〈多元文化或同化: 亨廷顿的族群文化观与东南亚华族〉, 《南洋问题研究》第2期, 页1-10。
- (魏安国) Edgar Wickberg. 1965.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 William Skinner. 1957.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 G.
- G. William Skinner. 1958.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 William Skinner. 1960.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 Thailand and Java”, 《南洋学报》第16卷, pp 86-100.
- Sharon A. Carstens. 1988. “From Myth to History: Yap Ah Loy and the History Past of Chinese Malaysian” .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X, No.2 , pp185-208.
- Tan Chee Beng. 1979. *Baba and nyonya: A Study of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peranakan in Malacca*, Cornell University.
- Tan Chee Beng. 1988.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Pelanduk Publications.
- Tan Chee Beng. 1983 “Acculturation and the Chinese in Melaka: The Expression of Baba Identity Today”, in *The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Identity, Culture and Politic*, Vol.2, edited by L.A.P. Grosling and Linda Y. C. Lim , Singapore: Maruzen Asia , pp56-78.
- Tan Chee Beng, 1993.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Fajar Bakit.
- Tan Chee-Beng. 2002. *Chinese Minority in a Malay State—The Case of erengganu in Malaysia*,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Tong Chee Kiong and Chan Kwok Bun, “Rethinking Assimilation and Ethnicity: The Chinese of Thailand” , in *Alternate Identities: The Chinese of Contemporary Thailand*, edited by Tong Chee Kiong & Chan Kwok Bun. 2001.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pp9-40.
- Victor Purcell. reprinted in 1967. *The Chinese in Malay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Gungwu. 1991.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pp3-21.
- Wang Gungwu. 1991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责任编辑: 蔡莉玫)